

懷念二叔

● 巴 金

近幾年我常為自己的「全集」寫後記，一年中寫三四篇「代跋」，要解釋舊作，我有時談到成都的老家。今年夏天我雖然寫得少些，但是我造過一個愉快的夢，在一間有紗窗的木板壁漆成綠色的書房裏我和三哥李堯林站在書桌前聽二叔講書。「必訟！」二叔忽然拍着書桌大聲說，「說得好！」

我吃了一驚。在1989年大病之後我總是睡不安穩，也少造夢，就是進入夢境，也恍恍惚惚，腦子並不清楚。這一次卻不同，我明明感覺到舒適的夏夜涼風。醒在床上，我還聽見二叔的聲音，他講書時常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必訟！」我很激動，一兩個小時不能闔眼，我在回憶那些難忘的事情。

對二叔李華封我了解不多，他平日很少同我和三哥交談，也不常對我們訓話，我們見到他打個招呼，他溫和地答應一聲。他的住房在後面一進，旁邊便是大廚房，前幾年我沒有進學堂而在私塾中又相當自由的時候，午飯前常常溜到大廚房裏看謝廚子燒菜，很少聽見二叔房裏罵人或吵架的聲音。人們說他的脾氣不壞。

我只知道二叔是本城一位掛牌的大律師，年輕時候在日本東京學過法律。他在成都也有點名氣，事務所就設在我們公館裏，三叔是他的助手，另外還有一個年青的書記員，我和鄭書記員熟習了，晚上沒有事就去找他下象棋。鄭書記員有一回向我稱讚二叔在法庭的辯護很精彩，他甚至安排我同他一起去法庭旁聽。我們的確去了，可是本案審訊臨時改期，我以後也沒有再去。

我沒有聽見二叔談日本的事情，只知道他有一個筆名(也就是室名)叫箱根室主人。他活着的時候我說不出箱根是甚麼地方。1961年我訪問日本到了箱根，不由得想起亡故多年的二叔，好像一下子我們的距離縮短了。我當初為甚麼沒有想到他在那個時候就喜歡箱根，我一直以為他是守舊派，甚至把他寫成《激流》中的高克明。在小說裏我還寫了淑貞的纏腳。但我堂妹的腳不久就得到了解放，在我們老家找不到一個老頑固了。

說到二叔，我忘不了的一件事，就是他做過我和三哥的語文老師，在我們離家前兩年給我們講解過《春秋

左傳》。每天晚上我們到他的書房，講解告一個段落，我們便告辭回屋。他給我們講書，因為他對《春秋左傳》有興趣、有研究，此外，還有一個原因：他太寂寞，三個兒子都病死了。他可能把希望寄托在三哥和我的身上。

我常說自己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我看不少人都是這樣，我在二叔身上也看到了矛盾，我對他平日總是敬而遠之，並無惡感，但也不親近。我還記得一件事情：編輯《平民之聲》旬刊的時候，我常常把剛剛印好的刊物放在家裏，就放在我和三哥住房對面的空屋內。有一天我進屋去拿新送來的報紙，門開着，二叔走過門前便進房來，拿起一張報紙看了看，上面有我介紹《托爾斯泰的生平與學說》的長篇連載，最後還有報社的地址：成都雙眼井二十一號李芾甘。他不滿意地看了我一眼，好像要說話，卻甚麼也沒有講就放下報紙走出去了。我以為他會對大哥提起這件事訓我一頓，後來才知道他只是要大哥勸我在外面活動時多加小心。這些話我當時聽不進去，以後回想起來才明白這是他的好意，我和三哥出川唸書，也得到他的鼓勵和幫助。

我想起年輕時候讀過一部《說部叢書》，這是當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翻譯小說，有文言，有白話，全用四號字排印，一共三集，每集一百種。這些書打開了我的眼界，使我關在家裏也看到外面世界，接觸各種生活，理解各樣人物。我覺得它們好像給我準備了條件，讓我張開雙臂去迎接新的思想，迎接新的文化運動。書都是大哥從二叔那裏借來的，為了這個我常常想起二叔。「文革」結束，我得到真正的解放後在舊書店買到一部這樣

的《叢書》，還有未出齊的第四集。我的許多書都捐贈出去了，這叢書我留着，作為感激的紀念，不僅是對二叔，而且也對大哥、對別的許多人，我從他們那裏吸收了各種養料。沒有從他們那裏得來的點點滴滴，就沒有今天的我。

我繼續回憶，繼續思念，好像用一把鋤頭慢慢地挖，彷彿用一支畫筆慢慢地描，二叔在我眼前復活了，兩眼閃光，興奮地說：「說得好，必訟！」他又在講解《左傳》，又在稱讚《聊齋》的「春秋筆法」。他向我們介紹蒲松齡的好些作品，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篇告倒冥王的《席方平》。席方平替父伸冤備受酷刑，他不怕痛苦堅持上告，一級一級地上控，卻始終得不到公道。冥王問他還敢不敢再告狀？他答說：「必訟！」酷刑之後再問，他還是：「必訟！」響噹噹的兩個字真有斬釘截鐵的力量。但是他吃盡了苦頭，最後一次就回答冥王：「不訟了。」他真的不再告狀嗎？不，他講了假話，只是為了保護自己，事實上他堅持到底，終於把貪臟枉法的冥王和官吏拉了下來。

我記起來了，二叔說過類似這樣的話：「席方平他講真話受到嚴刑拷打，講假話倒放掉了。然而他還是要講真話。他就是有骨氣！」寫文章要有骨氣！原來二叔也是教我講真話的一位老師。

怎樣寫文章，我本來一竅不通，聽慣了二叔的講解分析，我感到一點興趣，有時也照他的辦法，分析讀過的文章，似乎有較深的理解，懂得一點把文字當作武器使用的奧妙。以後我需要傾吐感情、發泄愛憎的時候，我寂寞、痛苦、憤怒或悲傷的時候，我就拿起筆瘋狂似地寫着。深夜我在

自己房裏聽見大哥一個人坐進放在大廳上的轎子、打碎窗玻璃的時候，我不能控制自己，便在練習簿上寫下一些不成篇的長詩。後來我在法國沙多一吉里讀到報導兩個意大利工人遭受電刑的時候，我寫出小說《滅亡》中一些重要的章節。我寫着，自己說彷彿有一根鞭子在我的背上猛抽。我對準痛處用力打擊，我的感情彷彿通過我的心、我的手全部灌注在筆下寫在紙上，變成了我的呼喚，我的控訴，我的叫號。

最初的年代裏我到處跑，只要手中有一支筆我便到處寫作。心裏想些甚麼，我就寫些甚麼。我並不苦思苦想，尋找打擊要害的有力的字句，我讓感情奔放煽旺心中的火，推動我這支毫無裝飾的筆飛越一張一張的稿紙。我沒有學會一字誅心的筆法，我走自己的道路。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我終於從荊棘叢中走了出來。

我一再聲明，反覆解釋，我不是文學家，也不懂藝術。有人嫌我囉嗦，其實我不過在講真話。「文革」期間我曾幾次被趕出文壇，又偷偷地溜了回來。現在我還不知道是否已在文壇「定居」。但是自己早有思想準備，不會太久了！

接連幾個不眠的長夜，我睜着眼睛在思索，在回憶。灰堆裏還閃亮着火星。我不是懷念亡故的親人，難道是在為自己結帳，準備還清欠債？

那麼是時候了。

又想到了二叔，關於他許多事情我都記不起來了。我父親只活了四十四歲。二叔活過了五十，但是他做五十大壽的時候我早已離開成都，現在連他的忌辰也弄不清楚了。我們出川後還同他通過三四封信，「文革」之後只剩下一頁無尾的殘箋，他的手迹對

我還是十分親切，使我想起他那些勤奮治學的教誨，最近我把六十幾年前這一頁舊信贈給成都的慧園，說明我今天還不曾忘記我的這位老師。

我記不起我擱筆有幾年了。寫字困難，我便開動腦筋，懷舊的思想在活動，眼前現出一張一張親切的臉。我的確在為自己結帳。我忽然想再翻一下《春秋左傳》。多年不逛書店了，我請友人黃裳替我買來一部有注解的新版本，不厚不薄，一共四冊，我拿着翻看，翻過一冊又是一冊，我忽然停住，低聲唸了起來：「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我不再往後翻看了，我彷彿又站在二叔的寫字枱前。熟悉的人，熟悉的事。治學有骨氣，做人也有骨氣。人說真話，史官記實事，第一個死了，第二個站出來，殺了三個，還有第四、第五……兩千五百三十九年前的崔杼懂得這個道理，他便沒有讓「太史盡死」。

崔杼是個聰明人，他當然知道即使不放過一個史官，他也阻止不了「執簡以往」的人。二叔知道這個，我也知道這個，他的確是我的老師。

1991年11月15日

巴金 原名李芾甘，1904年生於四川成都，為中國現代及當代文學巨擘，對中國新文學運動影響深遠。他的作品極多，包括小說、散文、翻譯、遊記、雜文、隨想等，其中不少已被譯成各種外文，飲譽海外。